

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百年回顾

杨 阳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于20世纪20年代初创建以来,一直存在身份识别的困难。萧公权“采政治学之观点”的研究进路,彰显了其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属性。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重建,逐渐形成了研究对象的选择应充分考虑中国政治思想史特殊性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形成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引入拓展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选题视野和研究范围,有力地推动了编撰体例、书写风格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带来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空前繁荣,涌现出了学界公认的“刘泽华学派”和9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样的学科百年发展史上的典范之作。但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的中国特色的彰显,并未能彻底消解其与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间固有之张力。如何将中国政治思想有机融汇于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仍需做出更多的探索和尝试。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 传统政治哲学 政治文化传统

一、民国时期:学科的兴起与早期研究特点

20世纪20年代初,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开始出现在部分高校的政治学系。1922年春季和冬季,梁启超先后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稍后,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相继推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也意味着该学科在中国的正式创建。

当时中国的大学都以传播和讲授现代知识为主,政治学系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内容,也多照搬欧美大学的相关专业,中国政治思想史受重视程度远不及西洋政治思想史。后者在主流大学中开设较早,且多设为必修课^①,前者最初多以讲座形式出现,在主流大学中多列为选修课。1928年,当萧公权受聘于南开大学开设西洋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发现“‘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准备起来比较容易”,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却“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收辑编排”^②。

① 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将“西洋政治思想史”列为必修课。参见《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萧公权:《南开东北燕京五年半》,收录于《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文亦收录在《萧公权文集·问学谏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政治思想史教学重西洋而轻中国的情况,在民国大学中始终存在。这固然与当时大学教师多是欧美留学归来、知识背景西化色彩浓重有关,但也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编撰体例、叙事风格过于传统,无法实现与现代政治学概念的互释对接,难以纳入政治学知识体系有关。20世纪20~40年代,陆续有10余部以“中国政治思想史”或“中国政治哲学”冠名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大多采用传统经学或史学方法,将相关资料整理归类,辨别真伪,考订含义,再略加解析。梁启超早年提出的“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宗派研究法”^①,亦多为这些著述所遵循。其间虽有强调要研究政治思想产生背景者,也有主张应采取社会史研究进路者,但总的说来,他们所提出和坚持的编撰体例——“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②,仍大致可以对应梁启超提出的上述三种研究法。

当时也有作者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主要视角来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店,1937)就是如此。吕著明确提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第一重要的,须要正确地掌握这一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③。但在实际书写中,吕著与其他多数作品并无明显差别,仍是采取传统的列传体编写方式,运用训诂、考据等方法,以厘清概念和命题含义为重点,读起来更像是史学著作,政治学色彩较为淡薄。

当此之时,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多数学者,传统知识功底明显好于西学基础,其作品呈现出上述特点,应不难理解。他们中只有萧公权是个例外。萧公权有扎实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基础,而同时讲授中国和西洋政治思想史,也锤炼出了其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他坚持“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的研究进路^④,写就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民国时期的典范之作。

“采政治学之观点”的典范意义,首先表现为借助政治学的主要议题来框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从而避免了当时多数作品普遍存在的研究对象选择过于宽泛、叙事主题难以集中等问题,突显了政治思想史应有的品格,使之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区分开来,这为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相关知识纳入政治学学科体系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它的典范意义,还表现在对概念、命题的引入和处理上。萧著引入了许多政治学概念,借助这些概念形成了与上述作品颇为不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风格。对某些很难以引入方法替代的传统概念或命题,萧著也多以政治学概念加以对照,阐明两者之异同,使这些概念和命题的真实含义在比较中变得更为清晰^⑤。

萧著开启的上述研究进路,也曾遭到过某些学者的质疑,认为以西方政治学议题选择研究内容,复以西方观念对照解读,未必能做到“使客观数据呈现于读者眼前”^⑥,在研究中未免“失之主观”。但萧著的研究进路,不仅为1949年后台湾学者不同程度地遵循^⑦,20世纪80年代后,亦为大陆许多研究者所坚持。

①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2~1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参见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4页,上海书店,1982年版。

③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

④ 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之《凡例》,联经事业出版公司(中国台北),2001年版。

⑤ 这一点,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多处“范例”,如在叙述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时,萧公权特别指出孟子此论与现代民主思想的区别,解释说“孟子贵民,不过以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只能做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在讨论法家的“法治”问题时,他又在简要解说了现代法治的特点后,指出现代法治与《管子》等法家所主张的所谓法治,“实为两极之相背”。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96~97页、第217页。

⑥ 参见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709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⑦ 据葛荃等统计,1949年之后,台湾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作也有近20部,除了王云五自认为其作品“颇异于萧氏之作”外,其余作品“具体论述也多承继萧公权”。参见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708~70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二、改革开放：学科的重建与研究的繁荣

1952年,政治专业的部分课程被归并到法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学中,政治学作为完整的学科和专业不复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因此陷于沉寂^①。在此后的近30年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吕振羽等少数著作曾再版问世外,新推出的相关成果寥寥无几。因此,与许多学科一样,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也面临重建的任务。

1981年,徐大同等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问世,宣告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重建的开始。1984年,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刘泽华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表的20余篇学术论文结集出版,这部名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的论文集第一次印刷发行2万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创造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著作发行的奇迹。同年,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朱日耀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推出,与徐著和刘著都是由“文革”前业已从教的老一代学者完成不同,这部著作的编撰,“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如孙晓春)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年轻一代学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重建过程中的成长与成熟,标志着该学科即将度过复兴阶段而走向繁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各种成果大量涌现,出版的相关著作、教材、论集近100部,笔者虽无法对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做出确切的统计,但初步估算应该有1000篇以上。除刘泽华等老一代学者继续领衔该领域的研究外,葛荃、张分田、孙晓春、张星久、杨阳、林存光、张师伟等50后、60后,乃至70后学者迅速成长,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较之20世纪80年代,涉及范围更为广泛,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和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繁荣。这一时期,涌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刘泽华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刘泽华、葛荃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中下册(刘泽华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张分田,人民出版社,2013)、《中国政治思想史》(张星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等代表性作品。特别是9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刘泽华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的推出,它较好地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传统等最新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整合于政治思想史叙事,堪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典范巨作。随着研究进入佳境,也产生了一些梳理和反思学术史的著述,如葛荃主编的《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等。

研究的繁荣,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现在各大学政治学系大多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列为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或政治文化仅召开过数次全国性学术会议,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成为每年定期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与论坛同步发展的还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这一学人团体(2014年成立)。尽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但经由改革开放40余年的积累,业已渐入佳境,也是不争的事实。

^① 1960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一度恢复政治学系,但不久更名为“国际政治系”,主要是开展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本科教育,其教学和研究内容延展至欧美政治及政治制度,但都没有设置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课程。参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史》(内部资料),第48页。

三、对象与范围：视野的拓展与新领域的开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处于复兴的初始阶段,其研究对象和方法很自然地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徐大同等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上述三项内容中的重点,徐著又强调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①

徐著的写作和出版恰在改革开放伊始,上述看法带有些许的时代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若抛开这些局限,我们仍能看出这一认识对萧公权所开创的学科传统的承续,只是在徐著这里,“政治学之观点”的前面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这一限定用语。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颇为活跃的刘泽华,虽不反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但却从人与自然、阶级调和、社会规范的公共性等角度,提出许多思想现象具有“超阶级”的特征,认为“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命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泽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实际上也包含着对“采政治学之观点”这一传统典范的质疑和修正。在刘泽华看来,以现代政治学议题裁定研究内容,会导致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像广角镜那样,从多方面着眼,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开展”,应该将天人关系、历史观等政治哲学问题,社会模式理论,治国的方略与政策,伦理道德问题,以及政治实施理论和政治权术理论纳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②。在后来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刘泽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指出就是要“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③。

正如前文所述,对萧公权以政治学议题框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台湾学者王云五曾表达过含蓄的质疑。虽然这种质疑的立足点也是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但却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可行的纠偏方法,刘泽华的质疑却是出于其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思想整体特点的独特认知,带有明显的理论自觉性质。在刘泽华看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利益问题“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因此,政治权力“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④,相应地,中国古代思想家也都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思考,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等这些看似与政治牵涉很少的论题,在他们特殊的思维模式下,都成为了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⑤。

强调研究对象的选择应优先考虑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是会降低对

① 参见徐大同等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2~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以上刘泽华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讨论,均参见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5~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刘泽华:《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⑤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多年后,刘泽华曾作出详细的回忆和说明,参见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第269~27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研究者政治学知识素养的要求,可能会造成研究作品政治学色彩相对淡薄的后果,引发学科归属上的困惑^①。但这一主张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某种理论框架的引入固然可以引发新的问题意识,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但决定这些问题意识“真伪”或价值的,不是理论分析框架,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简单地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议程选择研究对象,不仅有可能忽略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大政治思想议题,还可能形成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这会使很多问题的研究滞留在浅表层面,难以深入到作为其理论与逻辑基础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维等领域。

正因为以本身固有问题来确定研究对象,逐渐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才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选题视野的急剧拓展,这不仅表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更表现为政治文化传统这一全新领域的开拓,而该领域研究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清楚地表明“采政治学之观点”与充分关照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政治文化原本是现代政治学开创的研究领域。阿尔蒙德(G. A. Almond)的经典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后,该领域的研究才在大陆逐渐兴起。但是政治文化研究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依据“刺激—反应”理论,采取抽样调查等实证方法,其研究必须以样本的现实存在为前提,难以在历史研究领域运用。20世纪80年代末,刘泽华及其合作者开始尝试将政治文化重新定义为“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并发表长文呼吁开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②。

所谓“文化政治化”,一则指政治制度和体制形成的文化环境,二则指制度和政治主体行为动力中的文化因素;而“政治文化化”,则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对文化的影响和整合作用。显然,这两个概念灵活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互动关系等理论,也借用了政治社会化等现代政治学理论,为将政治文化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通道,可以说是移植欧美学术概念、切实做到洋为中用的成功范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很少涉及的问题,如政治思维定式、圣王崇拜、君权合法性、权威类型、政权与教权的关系、精英群体的政治人格、皇帝名号的政治文化含义、臣民文化、巫术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等等,都纷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成为新的热点问题,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杨阳的《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张分田的《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葛荃的《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陈侃理的《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张星久的《“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等。

四、主角和议题的复位:体例创新与学科自觉

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深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也改变了以往中国政

① 比如已故的资深政治学者徐大同曾委婉地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材、著作,认为它们大部分“都带有哲学、史学的痕迹,政治学学科色彩不够突出”(参见徐大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并一直强调要用政治学视角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直到2015年,他仍念念不忘要“从政治学角度完成汉魏、唐宋、明清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参见上书之“后记”)。

② 参见刘泽华、葛荃、刘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治思想史著作的编撰体例和叙事方式。如前文所述,民国时,杨幼炯曾提出“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三种体例,在此后数十年的实际编写中,大多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列出章节,再将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评介列入。这种“列传体”通行或独大的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得以改变。1991年,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19个重要问题一一列出,作为各章题目,分别阐述,从此,“问题体”或“思潮体”亦成为重要的编撰体例形式。

编撰方式的创新,还显著地表现在通史的编撰上。1996年,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3卷本)采取了“问题体”与“列传体”相结合的编撰方式。虽然该书各章节仍主要以评介思想家个人思想为中心,但在这之前或之后,多有概述性质的章节,对该时期政治思想的主要问题、特点及演进趋势做出纲领性的论述。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以6章篇幅讲述西汉政治思想,首章将陆贾、贾谊、《礼记》、晁错、《淮南子》等西汉初期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政治思想统合于对西汉帝国的“政治设计”之中,次章则以“大一统”为主旨,从《春秋·公羊传》起,重点讲述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最后以《盐铁论》的“盐铁之争”收尾,不露声色地宣告了思想大一统进程的最终落幕。随后两章自然过渡到对“思想大一统”后果的讲述,分别用儒学政治观念的“经典化”和“社会意识化”,“君权合法性理论与君权调节论”予以展开。最后一章则谈西汉末年的政治调整理论及其最终的结果——“王莽改制”。

显然,这是一种将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有机统合于政治思想史书写的大胆尝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编撰体例的一次重要创新。类似的做法,更熟练地体现在后来出版的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9卷本)中,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论及^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推出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大多采取类似的编写方式,如前文列举的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就是如此。

上述体例编排和叙事方式,不仅凸显了时代需求和思想家的问题意识,也使政治思想流变的线索跃然纸上,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逻辑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编撰和书写方式的创新,与内容选定上的“主角复位”一道,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学科色彩。

如何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区别开来,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伊始,就一直是令许多研究者倍感困惑的问题。简单地讲,这个问题的出现,一则是因为中国古代思想本身就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二则是因为中国固有的经学和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政治学基础薄弱的学者在研究中难免会受其影响。20世纪80年代,这两者的影响又因学统一度中断而被放大。当时,因学科本身积累薄弱,学者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得不参照一般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故而导致中国政治思想史早期作品在对象选择上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高度重叠,很多在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或著作被忽略掉了,即便是那些纳入研究视野的思想家,对他们思想的研究,也因缺乏政治学视角而难以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研究区别开来。

上述这种“主角缺位”和“议题错位”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得到了纠正。前述刘泽华主编3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许多部分——如前述西汉部分已经完成了主角和议题复位工作,到2014年《中国政治思想通史》(9卷本)出版时,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分卷中都得到解决。

该书改变了过去以思想家作为单一议题的做法,大幅度增加了讲述统治集团和政治家思想的篇幅。如《秦汉卷》《明清卷》开卷都用3章讲述统治集团的思想,《隋唐卷》则用3章篇幅集中

^① 参见杨阳:《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典范——评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5期。

讨论了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的政治思想,《明清卷》对朱元璋、朱棣、高拱、张居正也都设有专节论述。在思想家的选择上,很多分卷也为以往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较少涉及的重要政治人物——如宋濂、方孝孺、邱濬、海瑞等辟出专节加以介绍。这种编写方式修正了主角和议题错位的问题,反映出经历了数十年的复兴和发展,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已萌发出了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

五、史学方法的超越:哲学史进路的引入和社会史进路的矫正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之初,研究者多是史学背景出身,多采用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叙事方式,一般先对思想家著作,以训诂、考订等方法确定其真伪,辨明章句本意,再分类归纳,得出结论。成果形式也多采“列传体”,按思想家生活年代依次排列。故这些作品很像资料汇编,少有理论分析,史学味道浓重,很难看出是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直到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问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萧著虽声称是“用历史之方法”,但“采政治学之观点”,使其对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以往同类著作大不相同。他不再注重思想家师承脉络的考订辨正,也不再执着于章句的训诂释义,而是将政治学的视角作为资料分类原则,按照政治学相关议题,对各种思想资料整理归类,再运用归纳逻辑推导出相应的结论。所以“采历史之方法”,在萧公权这里,除了表现为按照时间年代顺序的编撰体例外,更多地表现为对归纳法的运用。萧著的这一方法,一直为两岸多数学者所沿用。20世纪80年代大陆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都是运用这一方法完成的。

归纳法是证成或证伪命题极其重要的方法,是科学研究和现代学术活动中普遍运用的基础性方法。对思想史研究来说,归纳法的运用,是确保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的前提,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整理和归纳史料,固然可以告诉读者思想家说了什么或主张什么,但是却很难告诉读者他为什么这么说或为什么这样主张,更难以告诉读者思想家的主张A、B及C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思想史研究特有的魅力,因方法的局限而被消解。问题的关键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汇集了人类的理性和情感,其内在的机理、逻辑、意蕴和精妙之处,单纯地运用归纳法往往不能使之完整地呈现,需要引入相应的办法加以补充和完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刚刚传入的海外新儒学作品影响,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体认、联想等方法来解读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被笔者称之为“哲学史进路”的研究方法^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书写风格,使研究者更加注重发掘思想史中的逻辑关系,力图将思想生产的思维过程和逻辑线索清晰地呈现给读者。这一方法的引入,对改变以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因为方法单一造成的叙述方式枯燥等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至于其在某些“大陆新儒家”那里被过度使用,甚至取代归纳法而成为最基本的思想史研究工具,则是另外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尝试从这一特殊视角切入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②。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刘泽华较早著文呼吁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提出所谓“思想与社会互动”,不是指在思想史研究中先做社会背

① 参见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之《自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如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景介绍,不是要将社会 and 思想分别加以研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具体地说,就是要研究“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以及“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①。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刘泽华又列举出6个相关问题领域,作为开展这一研究的重点^②。

上述主张,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史研究进路。以往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在思想史的编写中,首先要陈述其社会背景,在最后的评论中也要述及思想的历史作用。这种研究方式的初衷,是希望以社会背景的陈述来解释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而评估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但在实际书写中,却逐渐变成了令人生厌的新八股。关键是在背景与思想之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原本就是困难的,至于对影响的评估,因全无数据支撑,更多是流于形式主义的陈词滥调。刘泽华强调研究“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就是希望克服上述流弊。

尽管在将政治文化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时,刘泽华等已经对其含义做出了一定的修正,但是作为行为科学概念,其特有的功能并未完全消解。“文化政治化”“政治文化化”,都必须依托特定的行为科学理论才能得到完整的诠释。剔除历史研究中无法完成的抽样统计等具体研究方法后,政治文化概念的行为科学导向,在历史问题研究中,必定会促使研究者以探究和建构某种解释模式为目标,而这又必须以打通思想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的区隔为前提。应该看到,刘泽华晚年主持编撰的著作,都带有这一尝试的痕迹。前文提到的葛荃、张分田、杨阳、张星久、陈侃理等相关著作,也都是尝试运用上述方法的代表性作品。

六、开放与融通:学科的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涌现出众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泽华总主编的9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部长达535.6万字的皇皇巨著,在刘泽华及其团队数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其在研究视野、对象选择、编撰体例、研究方法和叙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堪称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百年以来的典范之作。

因刘泽华及其团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特殊贡献,进入新世纪后,学界逐渐产生了“刘泽华学派”或“南开学派”的说法,2013年之后,还出现了多篇研究该学派的专论^③。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政治学界依托本土资源创新能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刘泽华学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独特价值。

今天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其对象更明确,视野和范围更开阔,编撰体例和书写方式更多样化,方法论上也多有创新之处。但是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它的进一步发展还面

① 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② 刘泽华、张分田:《开展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③ 2005年,大陆新儒学代表人物陈明最先提出“南开学派”“刘泽华学派”等概念。随后,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李冬君《真理之辩——读毕来德〈驳于连〉》(《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5期)、秦进才《形式主义史料与政治文化的存在方式》(《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李振宏《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等都曾使用“刘泽华学派”等概念。2013年,李振宏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近4万字长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对“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学派”等概念做出了学理论证。2015年,方克立在《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学派与学术——关于“王权主义学派”及其思想的争鸣——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第三次提到并评论了“刘泽华学派”的学理特征。王学典等将刘泽华所代表史学流派称之为“新启蒙史学”(参见王学典、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临许多挑战;研究队伍虽不断壮大,但仍存在学科背景庞杂、专业训练不足等弱点;新一代研究者大多存在古汉语和历史学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研究成果总量上虽不断增加,但大多是重复前人的选题或观点,真正有创新价值的高质量成果不多。

作为交叉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创建之初起,就一直存在着学科身份辨识的问题。萧公权通过“采政治学之观点”的方式强化了其政治学学科属性,却无法消除其以中国固有知识为研究对象特征,因而也就无法彻底消解中国传统知识与现代政治学这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固有的张力。过分强调以政治学议题裁定研究对象,固然会扭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本来面貌,但单纯地以中国思想特殊性为由拒斥政治学概念、命题和理论的引入,又可能将研究封闭在传统经学的狭小空间内,使之丧失政治学学科属性,进而丧失其成功转换为现代知识的可能性。如何缓解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张力,如何通过概念和命题的互释,实现这两个话语系统的衔接与融通,一直都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

从萧公权“采政治学之观点”开始,到刘泽华等开辟传统政治文化领域,历代学人在研究中引入了众多的政治学概念,这些概念今天已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某些很难用引入方法替代的概念和命题,研究者也多以政治学概念加以对照,阐明两者的异同。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参照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固有概念基础上创造新概念的努力。比如刘泽华借鉴专制主义概念,结合中国历史上“权力支配社会”的现象,创造出“王权主义”概念。这些努力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种知识之间的张力,但要想彻底消除这种张力,还需要作出更多的探索和努力。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本土化呼声的高涨,有人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固有概念、命题来重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于这些固有概念,大多存在着分类随意、内涵模糊、边界难辨等问题,运用它们进行研究,用现代学术标准来衡量,很难做到逻辑自洽。运用它们书写出的政治思想史,不仅难以纳入政治学知识体系,也会为今天的读者制造不必要的阅读障碍。政治学的概念和命题,不单是话语表达形式,它还体现着当下的政治实践所衍生的问题意识。缺乏政治学的理解和分析视角,在研究中有可能陷入无意义的思考而不自知。这种倾向,虽不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但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作者: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市,102249)

(责任编辑:林立公)